

# 选学骚类文献考述

熊良智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文选》研究,称为选学,其中保存着不少楚辞研究的资料,不仅可以用来校勘《楚辞》传本,而且也可以反映出时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其中的异说新解,也可以提供楚辞研究的参照。这在魏晋至唐代的现存楚辞缺乏较为系统专门之书的情况下,选学骚类研究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关键词:**《文选》;楚辞;文学思想;校勘;新说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6-0054-08

魏晋至唐代留存于今的楚辞研究专书极为罕见,目前仅见有释道騫《楚辞音》残卷,而大量的文献资料多散见于类书古注之中。《文选》因有“骚类”一体,历代相传,选学著作又层出不穷,其中保存着不少难得的文献资料。有鉴于此,本文搜求钩沉,借以窥其时代的楚辞研究面貌,探讨其新的特点和价值,以弥补文献不足之憾。

## 一 骚体分类的文学思想

经学背景下的楚辞研究,定位在经学评判上,性质上成了政治道德的工具,所以《离骚》是“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1](2页)。“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2](182页)。它们没有独立的价值,尤其没有独立的形式意义,虽然“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由于“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3](49—50页),是应该受到批评的。所以“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的诡异之辞,“康回倾地,夷羿殛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的谲怪之谈,“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的狷狭之志,“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

为欢”的荒淫之意[4](46—47页),都不同于儒家经典,被指以为“异”。而主张的是:“《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2—3页)文学艺术的形式在这里完全由思想道德决定着意义,由儒家经典的传统决定着他们的价值。在源流和类别上,它们也没有独立的地位。《汉志·诗赋略》是这样定位的: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惻隐古诗之义。[5](894页)

因此,楚辞作品都归于《诗赋略》中称之为“赋”,屈原赋之属即为代表,因为在经学思想中,有《诗》有赋,而“赋”是“古诗之流”,是“诗”的“六义”之一。

可是随着汉末社会的动荡,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儒学独尊地位一度动摇,经学束缚的解除,个体生命价值意识的增强和对个人内心感情的重视,独立的人格价值逐步建立,文学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以注重事功、政治教化为指导思想的文学价值观念,

收稿日期:2003-06-18

作者简介:熊良智(1953—),男,四川省金堂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以辞赋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传统思想遭到了质疑。这里我们可以建安时代的曹植与杨德祖的书信作为例证。曹植《与杨德祖书》说：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6](594页)

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他对辞赋文学仍视为“小道”，就因为不能“揄扬大义”。但是，杨德祖的《答临淄侯笺》却表示了不同意见：

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皆有设邪！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6](564页)

而随着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文学家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后汉书》专列《文苑传》，文学家的独立性也得到了认识。梁人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7](75页)

文学家的特殊性质就在“止于辞赋”，而与“通圣人经”的“儒”区分开来，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楚辞的创造作家屈原、宋玉等人。于是，对文章、文体有了更加精细的区分，有了更加系统的研究。我们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读到了这种讯息：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谏尚实，诗赋欲丽。[6](720页)

在陆机的《文赋》中有了进一步的区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诘。”[6](241页)文体有了长足的发展，梁朝任昉编《文章缘起》搜罗文体八十五类，刘勰《文心雕龙》论及八十一类<sup>①</sup>，而

且对文体风格、体制的研究、讨论也很盛行。《南齐书·张融传》曾载张融作《门律自序》论及文章体制风格的重要性：“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8](729页)文“以有体为常”，应当“使常有其体”，说明了对文章体制常规的提倡，也表明了对文体规律的认识，是一种对文体自觉意识的表现。而《通典》卷十六《选举》曾引述裴子野的一段话，又言论到当时的文风：

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行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王化本焉。而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花蕴藻，用以自通。若夫徘徊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曼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响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揆五车，蔡邕等之俳优，扬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悦，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兹有笃焉。自是闾巷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9](91页)

裴子野是坚持传统文学观念，推崇世用教化的，所以反对华美、靡曼，“摈落六艺，吟咏情性”，而其代表正是“楚骚为之祖”的一派。而萧纲《答湘东王和受试诗书》则又推崇风骚，吟咏情性，反对文学创作等同经传。他说：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宴，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10](543页)

看来是否摆脱经传，吟咏情性，正是二家争论的焦点，这也正是文学与非文学性质在当时的分界线，而楚辞是作为与儒家经典不同的、吟咏情性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或被推崇，或遭批评。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要特别肯定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骚体分类上体现出的文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就现存或所知的文献，任昉《缘起》已立“骚”体，其书不存，不知其中所录之作，但据《四库提要》卷一九五所云：“骚与《反骚》别立两体。”评其所分：“皆不足据为典要。”[11](1780页)梁朝以前，又有杜预《善

文》、李充《翰林论》、挚虞《文章流别集》，今皆亡佚，唯挚虞《文章流别论》还有断篇残简见于类书古注。不过就“骚”体而言，挚虞仍然视之为赋。他在《文章流别论》中说道：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云称赋莫深于《离骚》。[12](1905页)

看得出挚虞基本上是经学传统的文学观念，在源流上以楚辞为赋，古诗之流。但是，《文选》分文体三十九类<sup>②</sup>，在赋、诗后面独立“骚”体一类，收录楚辞作品，包括屈原《离骚》、《九歌》六首、《九章》中《涉江》，又《卜居》、《渔父》，宋玉《九辩》五首、《招魂》以及《招隐士》。他把楚辞同赋分为不同文体，打破了传统的分类方法，摆脱了将楚辞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与汉晋以来观念不同。《汉志·诗赋略》列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作品为赋，四种赋以屈原赋为首。皇甫谧《三都赋序》还称：“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6](641页)萧统在《文选序》中说道：

又楚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6](1页)

在收录了远自周秦，近至齐梁，共一百三十余家，而专以屈原所代表的“骚人之文”而论，正是表现了他的文学观念，主张抒写个人情性，并以能文为本，而与经学、子书、史传区别开来。这在《文选序》中还有说明：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于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

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6](2页)

这当然表明了时代的文学观念的变化，表明了人们对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认识，而力图建立真正独立的文学观念，昭明《文选》的分类正是一种集中的反映，而“骚”体分类尤其具有意义。钱穆先生曾著文说：“纯文学作品当自屈子《离骚》始，然屈子特以一政治家，忠爱之忱不得当于君国，始发愤而为此。在屈原固非有意欲为一文人，其作《离骚》，亦非有意欲创造一文学作品。汉代如枚乘、司马相如诸人，始得谓之是文人，其所为赋，亦可谓是一种纯文学。然论其作意，特以备宫廷帝王一时之娱，而藉以为进身之阶，仍不得谓有一种纯文学独立价值之觉醒存其心中也。”[13](97页)而这种真正独立的文学价值观念正是在建安以来的文学的自觉时代中产生的，也就是说过去虽有真正的文学作品存在，却并没有真正作为文学来认识，体现在文体分类上，则应以《文选》为标志。钱穆先生肯定了《文选》骚体分类的价值。他分析“骚人之文，自兹而作”的意义说：

此述屈子《离骚》。下开诗境，以其同属言志抒情，故连类而及，以示别于上述纪事咏物之赋也。宋玉与荀卿并举，列之在前，顾独以骚体归屈子，不与荀宋为伍，此一分辨，直探文心，有阐微导正之功矣。[13](118页)

这里所说的“直探文心”，正是指的骚体分类所代表的独立的文学自觉意识。它不仅清除了自汉代以来蒙在楚辞上的经学阴影，还原了楚辞作为文学的真正面目，而且正确揭示了楚辞在文学史上的真正地位，代表着抒写个体情性的真正文学的产生。这当然也是由时代的学术思想和文学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从曹丕的《典论·论文》我们看到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而与《文选》同时代产生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以《辩骚》为文之枢纽，罗宗强先生就认为，刘勰要强调的是“纯文学作品模仿对象”[14](280页)。更为有意义的，也是同时代产生的阮孝绪的《七录》第一次将“楚辞”独立分类，在图书目录中突破《七略》、《汉志》的传统，设立《文集录》，包括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15](27页)。以楚辞为文集之首，正是从学术上肯定了楚辞在文学中的开创地位。因此，昭明《文选》的骚体分类，正是文学自觉时代的学术思想在文体上的反映。

## 二 骚类文献钩沉

昭明《文选》编纂于六世纪初,而《文选》之学,据《大唐新语》卷九《著述》曾云:“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16](363页)曹宪曾仕隋,为秘书学士,后又有李善、五臣等数家之书。而称为唐写本的日本金泽文库所藏的《文选集注》,也可以说搜罗宏富,其文献珍贵,甚至有千金之誉。就《楚辞》而言,现存传本最早的是宋刻之书,唐代以前面貌,多有赖《文选》,既可考查古本楚辞之旧,亦可校正后世楚辞之书。具体说来,选学著作中骚类文献价值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 (一)校勘传本

与现存的《楚辞》专书(此用金陵书局重刊汲古阁本《楚辞补注》)对勘,我们发现选学文献中有不少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楚辞旧本的面貌,纠正后世流传文献中的错误。

首先,可证衍文。《离骚》:“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洪兴祖《考异》云:上句“《文选》无‘不’字”;下句“《文选》云:何不改其此度。一云:何不改乎此度也”。检今本通行《四部丛刊》本《六臣注文选》作:“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其此度也。”[17](605—606页)胡刻《文选》作“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其此度也”。可知现通行《文选》已非洪兴祖所见《文选》。刘师培《楚辞考异》于此无考[18],闻一多《楚辞校补》仅出异文:“何不改乎此度也”,并引《文选》为证,于上句无校[19](356页)。后世学者于上句“不”字多有争论。洪兴祖《补注》:“不抚壮而弃秽者,谓其君不肯当年德盛壮之时,弃远谗佞也。五臣注误。”而五臣刘良解此句说:“言持盛壮之年,废弃道德,用谗邪之言,为秽恶之行,何不早改此法度,以从忠正之言。”二家所解分歧,正在上句有无“不”字。这条争论一直延续到现代学者。但考王逸注云:“言愿令君甫及年德盛壮之时,修明政教,弃去谗佞,无令害贤,改此惑误之度,修先王之法也。”则知古本此句无“不”字。检韩国1996年版奎章阁《六臣注》,正作“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由此知此句“不”乃衍文。又如《渔父》云:“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考异》云:“一无‘而’字。”检《文选》无“而”字,闻一多先生《楚辞校补》引各类书古注可证“而”字为衍文,云:“当依一本删‘而’字。”尤其是《离骚》“日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洪兴祖《补注》以为“王逸无注”,“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清人屈复《楚辞新注》

根据《离骚》章句结构每四句一节,认为“此多二句明系衍文”[20](419页)。闻一多先生又从《离骚》用韵规律证明,而文献依据还是《文选》无此二句。

其次,可补脱文。《卜居》:“往见太卜郑詹尹。”《考异》:“一此句上有‘乃’字。”闻一多《楚辞校补》引《御览》等书证明,认为应“补乃字”,而《文选》皆有“乃”字。又:“龟策诚不能知事。”《考异》:“一云知此事。”而考《文选》所载,亦作“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则《楚辞》脱一“此”字。

再次,可校异文。《离骚》:“周论道而莫差”,古今各本均无异文,《文选集注》作“周论道既莫差”[21](1·836页)。又“众皆竞进以贪婪兮”,《文选集注》:“今按:陆善经本无‘众’字。”[21](1·806页)《招魂》:“豺狼从目,往来优优些。”《文选集注》:“今按:陆善经曰:本此二句在‘一天(夫)九首’之上。”[21](2·17页)又:“引车右还”,洪兴祖《考异》:“还,一作旋。一云‘引右运’,无‘车’字。”而《文选集注》作“引车右运”,引《音决》云:“还,音旋。按《文选》本尽作‘还’,而《楚词》作‘运’。音旋。”[21](2·62页)可知,只有《文选集注》“还”作“运”,并不见有作“运”的《楚词》传本。又:“洒繁炮羔”,各本《楚辞》、《文选》“洒”字,或作“灑”,作“𩇛”,作“濡”。王逸于此无注,夫容馆本《楚辞章句》作“𩇛”,洪兴祖《补注》作“𩇛繁炮羔”,却释“濡”字,补曰:“濡,《集韵》音而,亨肉和滓也。”案《集注》作“洒”,无案语考异,又引五臣张铣云:“洒,煮也。”知唐人诸本以“洒”为是。寻《说文·水部》:“洒,淅也。从水而声。一曰,煮熟也。”[22](561页)《招魂》作“洒”,正合《说文》古义。此句“洒”、“炮”对文,“𩇛”、“濡”皆不得其义;“𩇛”与“洒”近,不及“洒”字为确。《玉篇·水部》释“洒”为“不熟而煮”[23](160页),正与下文“炮”字训“合毛炙物”相对成义。

当然,选学著作中可供校勘的材料更多的是见于《文选》注中,古今学者已多采用,此不赘述。

### (二)保存古注佚说

汉代是《楚辞》研究的开创时期,从王逸《楚辞章句》书中可知汉代已有多家章句、训解,而现存最早的则仅王逸《楚辞章句》一种,其余多已亡佚。因此,在古人著述中偶有发现,便弥足珍贵。今从选学骚类文献辑得数条,列之于后。

#### 1. 班固楚辞注

《文选》左思《蜀都赋》“其沃瀛则有攒蒋丛蒲”,

刘渊林注：“《楚辞》曰：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泽中也。班固以为畦。”[6](78页)胡刻《文选》此条注有逸文。《说文·田部》“畦”字段玉裁注说：“班固以为畦，田五十亩也。此盖班固释畦留夷之语，今俗本《文选》逸之。”[22](696页)段玉裁指出俗本《文选》有脱文，确为发明，但是，他所补释之文乃为无根据的臆测。因为刘渊林所引《楚辞》“倚沼畦瀛”乃《招魂》中句，刘渊林所引王逸注，也是节引，并非释《离骚》“畦留夷与揭车兮”句意。检《文选》集注作：“班固以为畦，埒名也。”[21](1·43页)此条不仅可补各本《文选》之逸，也可说是班固《楚辞》注的一条遗文。这条遗文对考证班固的楚辞遗著也有启示。据王逸《离骚后序》曾言班固撰有《离骚经章句》，“其馀十五卷阙而不说”，而此句乃班固释《招魂》中语，也可印证汤炳正先生曾据班固《离骚赞序》体例，并且言及《九章》，推测班固有《离骚赞》一书，“并非只谈《离骚》，实乃涉及屈赋的全部”[24]。《文选》中班固楚辞遗注除此条外，汤炳正先生在《班固屈学佚著钩沉》中则已引述二条：

《文选·吴都赋》：“翼颺之颺颺”句下，刘渊林注云：“《离骚》曰：溢颺风兮上征。班固曰：颺，疾也。”又《魏都赋》：“下畹高堂”句下，刘渊林注云：“班固曰：畹，三十亩也。《离骚》曰：既滋兰之九畹。”

## 2. 无名氏楚辞注

《文选·吴都赋》“职贡纳其苞匭，《离骚》咏其宿莽”，李周翰曰：“《离骚》云宿莽，宿，短草，莽，长草。”[17](103页)按此句所释，“宿，短草，莽，长草”似为《五臣注》中李周翰语，但检《离骚》“夕揽洲之宿莽”，李翰注云“宿莽经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则《吴都赋》句下所释并非李周翰语。检《文选集注》卷九李周翰的注语：“《离骚》谓致于裹匣而贡之也。注云：宿，宿草，莽莽，长草也。”[21](1·138—139页)此句似有错讹。“谓致于裹匣而贡之”，并非《离骚》句中意思，而是“职贡纳其苞匭”的注文，但“注云”以下是“宿莽”注语，推测当是楚辞旧注，虽不知何人所言，但在“宿莽”的训解之中，也算是一种别解。

## 三 选学骚类的异说别解

选学之书的文献价值有如上述，而其训解文义，征引旧籍，申述著作之由，也有不少新的观点和异说，在《楚辞》研究中具有不小的参考价值，有的还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尤其是在唐代楚辞研究中，由于缺

乏《楚辞》专书系统的研究，选学中骚类的见解，虽然是只言片语，也有值得珍视的理由。

《文选》作为文学总集，以能文为宗旨，突出了当时的文学的自觉观念，这在骚类作品的训解中，也表现出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繁琐的考证和微言大义的发挥，注重文章学意义上的疏通文义。这里我们先引述《文选》李善注节录王逸《离骚序》的文字：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离骚经》。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投而死也。[6](455页)

李善的节录，主要删掉了王逸《序》中关于屈原的身世和楚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内容，突出了屈原写作《离骚》的背景，这就突出了具体篇章的意义。尤其是李善删去了《离骚》的题解和关于“《离骚》依《诗》取兴”的一段解说。具体说来，即“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以及“《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和关于道德象征的话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等等，的确可以看出选学的一些思想倾向，即努力摆脱文学依附经学的地位，恢复楚辞文学作品的真实面貌，甚至淡化文学作品的政治道德功能。读李善《上文选注表》，也可看出他更多强调的是文学的特性，着眼于文学的风格、气质进行描述：

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汉朝才子，综鞶悦于遥年。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长离北度，腾雅咏于圭阴，化龙东骛，煽风流于江左。[6](3页)

而其注辑，是“握玩斯文，载移凉燠”。如果说李善节录王逸序文，未必就真有这样用心，我们还可以五臣注作一佐证。五臣注有张铚的序，其实也是删述王逸《离骚序》。不过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他虽然比李善详尽，但在引述释《离骚》时，却删掉了王逸所说的“经，径也”，也删掉了“依《诗》取兴”的话。再读《文选》骚类注中其他篇的序文，虽然也源自王逸，有所删节，也都具有相似的特点。李善注《文选》中《九辩》篇的序文云：

《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九者，阳之数也，道之纲纪也，谓陈说道德，以变说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闵惜其师忠而放

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也。[6](470页)

比较王逸的“序”文，李善删去了这样的话：“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暗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应该说，李善删掉的，正是王逸序中的政治道德解说的内容，尤其是在经学背景下的天人感应的思想文化倾向，所谓“明己之言，与天地合度”，特别是以“天有九星”、“地有九州”、“人有九窍”来证成《九辩》之“九”的意义。因而，李善的删述，就更带有一种价值判断和选择，也就是文学的选择，或者说文章学的选择。不过，李善的删节，也删去了很有价值的东西，即王逸《序》中关于“楚辞”的解说：“至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楚词。”说到这里，我们还不能不论及《五臣注》的《九章》的序文。《文选》有《九章》中的《涉江》篇，李周翰为《九章》作序，这样写道：

原既放逐，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义与《九歌》同。[17](622页)

这篇“序”文与王逸原序和李善的节录都很不同。王逸原序这样写道：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

李善《注》主要保留了“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故复作《九章》”至“甚著明也”，删去了“思君念国”一类的话，但仍然是“言己所陈忠信之道”。对比李周翰“自述其志”，似乎李周翰更加强调了文学作品抒写个人情性的特点，而不是作为陈述道德的教化工具。

当然，上述选学骚类的解说和对旧注选择表现出的特点，确有不同于汉代经学背景下的楚辞研究，而带有了更加鲜明的文学或文章学的研究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楚辞学的发展和进步。但选学中也有不少异说体现了时代的研究成果。比如，《招隐士》一篇的作者，《六臣注文选》就径直题为刘安，一改汉代以来传统的说法。本来《楚辞章句》王逸在《招隐士序》中说：“《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而《序》末又说：“小山之徒”，“故作《招隐士》之赋”。似乎《招隐士》的作者，不很明确，因为“小山之

徒”更像一个群体。而《序》中又说：“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仕，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这样“小山”又似乎成了诗歌的分类。王逸《序》的这种表述，确是自相矛盾。《招隐士》的作者究竟是谁？《文选》的说法究竟有无根据呢？《艺文类聚》卷八九有这样的载述：

淮南王好道，感八公，共登山，少攀桂树，安作诗曰：“攀桂树兮聊淹留。”[25](1537页)  
《初学记》卷十又载：

王逸《刘安〈招隐士诗〉序》曰：《招隐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26](240页)

其他还有《白氏六帖》卷三十也有类似说法。《艺文类聚》成书于唐武德年间，《初学记》成书于唐玄宗开元时期，可见《文选》题《招隐士》作者为刘安，乃是当时很流行的说法，这对楚辞作品的作者研究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其他《五臣注》中关于《九歌》六篇作品的神名的解释也有一些新说。刘良解“云中君”为“云师，屏翳也”，这与《楚辞》以“丰隆”为云神，以“屏翳”为“雨师”不同。又吕向解“东皇太一”说：“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五臣以“屏翳”为“云师”，这在《大人赋》中有“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或有依据；而言“东皇太一”“以配东帝，故云东皇”，则似乎缺少了一些制度和典籍的证明了。

不过，在《楚辞》研究中最有发明者，还见于《文选集注》所引《音决》中屡言之楚音与协韵。齐梁以来，声律之学兴起，言及楚音，刘勰似首倡其说：“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4](553页)其后《隋志》所载《楚辞音》数种，今有传世敦煌写本《楚辞音》残卷。《隋志》称骞公：“善读之，能为楚声。”[27](1056页)但皆未道其详，明确指某字作某读为楚音者，现存书中，首见于《文选集注》中之《音决》。现引述如下：

《离骚》“夕揽洲之宿莽”，《音决》：“莽，协韵亡古反，楚俗言也。”又“伤灵修之教化”，《音决》：“化，协韵呼戈反，楚之南鄙言，又火瓜反。”又“周流乎天余乃下”，《音决》：“下，楚人音户。”

《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音决》：“心，素含反。按方凡<sup>①</sup>、素含为楚本音，非协韵，类皆放此，而称协者，以他国之言耳。”

本此，可知《音决》的作者试图解决当时《楚辞》

韵读不谐的问题,但他所指出的楚音,同中原音韵比较,尚未见出特别的规律,也看不出一个独立的楚音系统,不过,确实反映了楚音的存在。或在唐人时代,自有其立论的依据,只是如今文献不足征也。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音决》所说的协韵,在就读《楚辞》中的意义,已不同于随文改读的传统观念,而明确提出新的观点,即认为楚辞的韵读不谐的原因,乃地方文学方音不同所造成,其音乃方音之正读,非后人改音以求协。故《音决》于《离骚》“夕揽洲之宿莽”句下有云:“凡协韵者,以中国为本,傍取四方之俗以韵,故谓之协韵。然于其本俗,则是正音,非协也。”

[21](1·793—794页)此与陆德明以前对典籍韵读之不协者,只以古今音变为说之外,又提出了方国异音之说,皆较当时随意改读以求“协”者进步。虽其所定具体音读未必即合楚音实际,但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亦为楚音研究提供一直接参考。

总之,《文选》骚类的异文、异说对楚辞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的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新见异说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一些新的倾向,这对从经学背景下逐步摆脱出来的楚辞研究,也展示了一些新的面貌和意义。

### 注释:

- ①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刘勰把文体分为三十四种,其中杂文又分为十九种,诏策分为七种,笺记则包括二十五种,实共八十一一种。”(中华书局1996年版,257页。)
- ②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引述台湾游志诚博士《论〈文选〉之难体》等,认为:“《文选》实际文体类目就应该是三十九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87页)
- ③《文选集注·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音决》:“枫,方凡反。”

### 参考文献:

- [1]王逸.离骚经序[A].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王逸.九辩序[A].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班固.离骚序[A].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5]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7]萧绎.金楼子:卷四[M].丛书集成:594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1.
- [8]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9]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0]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M].影印四库全书:1414册[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1]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3]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M].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
- [1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15]广弘明集[M].四部备要本.北平:商务印书馆,1936.
- [16]刘肃.大唐新语[M].影印四库全书:1035册[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7]六臣注文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8]刘师培.楚辞考异[M].刘申叔先生遗书[M].南宁武氏校印,1935.
- [19]闻一多.楚辞校补[M].闻一多全集:第二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2.
- [20]屈复.楚辞新注[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Z].济南:齐鲁书社,1997.
- [21]唐钞文选集注汇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22]许慎.说文解字[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23]顾野王.玉篇[M].影印四库全书:224册[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24]汤炳正.班固屈学佚著钩沉[J].四川师大学报古代文学专辑,1993.
- [25]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6]徐坚等.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7]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Examination of “Chu Ci” Literature in *Wenxuan* Study

XIONG Liang-zhi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quite a few “Chu Ci” study data in *Wenxuan* study which can be used not only to emend “Chu Ci” editions but to show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literary thoughts of the time, of which the new explanations of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present reference for “Chu Ci” study. It is indispensable in “Chu Ci” study where “Chu Ci” from Wei Jin and Tang is lacking in systematic monograph.

**Key words:** *Wenxuan*; “Chu Ci”; literary thoughts; amending; new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唐 普]

### ● 书讯

## 纪念李白诞辰 1300 周年论文集出版

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政府、四川李白研究会编辑的纪念李白诞辰 1300 周年李白诗歌研讨会论文集《千年诗魂·蜀道李白》(李白研究论丛第四辑)2003 年 9 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论文集是 2001 年李白研究会组织的纪念李白诞辰 1300 周年李白诗歌研讨会的学术结晶,在名誉会长王文才、会长万光治、秘书长吴明贤的指导下,对会议论文进行了精心的编选加工,共收录国内外学者对李白研究的 38 篇论文,并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外李白研究的成果进行了评介。

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江油市人民政府、四川师范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江油市文化旅游局和江油市李白纪念馆的大力支持。(二 晋)